

儿童情绪与社会性发展

主持人 刘精明[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中国社会学自恢复以来,关于教育不平等问题
的讨论经历了几个关键的转折,从对教育获得差异的家庭与社会原因的探索,到侧重儿童的学
校教育过程的分析,再到对儿童认知与非认知能力的研究等,较好地体现了一个逐渐扬弃传统
教育不平等议题、回归儿童发展本身的学术发展历程。但长期以来,囿于人们对教育公平问题
的过度甚至是偏狭的解读,教育社会学对儿童发展的认识仍然较为零散。生理、认知、情绪或
情感、社会性,是儿童发展的三个基本领域。社会科学研究如何以这三个领域的发展规律为基
础探索社会结构、社会过程等因素对儿童成长和发展的影响,在国内尚是一个并未完全展开的
学术领域,或可称之为“儿童发展社会学”。本专题三篇论文从不同社会过程或社会结构条件
来探讨儿童心理、情绪、社会性发展,是对儿童发展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推动。《隔代教养对
农村儿童社会性发展的影响——兼论父母教养投入的调节作用》呈现了隔代抚养对儿童社会性
发展影响的复杂形态,证明父母的教养投入是儿童健康人格发展更关键的影响力量,为推动国家
家庭教育政策的落实提供了重要研究支持;《农村户籍儿童的出生顺序与非认知能力——基于亲
子互动多重中介效应的分析》则发现在家庭资源相对有限的农村家庭,出生顺序对儿童的社会性
沟通交往能力仍然存在较为明显的约束作用;《方言能力、学校融合与流动儿童心理健康发展》发
现语言适应性这一关键的移民适应能力对流动儿童心理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隔代教养对农村儿童社会性发展的影响 ——兼论父母教养投入的调节作用

■ 琚晓燕 张晨轩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 社会工作系,北京 100089;中国公益研究院 养老研究中心,北京 100875)

【摘要】本研究旨在探讨隔代教养方式对农村儿童社会性发展的影响,进一步探索父母的教养投入是否对隔代教养家庭中儿童的社会性发展具有调节效应。采用隔代教养问卷、父母教养投入量表和儿童社会性发展量表对陕西农村的380个家庭进行问卷调查。结果发现:农村家庭隔代教养类型是儿童社会性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其中完全隔代教养家庭儿童的社会性发展水平显著低于不完全隔代教养家庭的儿童,也显著低于完全父母教养
DOI:10.16034/j.cnki.10-1318/c.2022.02.020

收稿日期:2022-01-10

作者简介:琚晓燕,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社会工作系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婚姻家庭、青少年心理健康;
张晨轩,中国公益研究院养老研究中心政策分析师,主要研究儿童与青少年发展、老年人服务。

家庭的儿童,后两者之间差异不显著;隔代教养类型与父母教养投入交互作用于儿童的社会性发展。即使在完全隔代教养家庭中,如果父母教养投入较高,儿童的社会性发展也趋于正常。上述研究表明,农村完全隔代教养方式对儿童社会性发展最为不利,因此,提高父母的教养投入是此类家庭干预的关键点。

【关键词】 隔代教养 儿童社会性发展 父母教养投入

一、问题提出

社会性发展是儿童健全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家庭是儿童社会性发展的第一个场所,家庭内的社会资本(如教养投入、父母期望、亲子间的情感支持等)是影响儿童社会性发展的直接因素^[1]。据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我国农村留守儿童人数已达6102.55万人,其中46.74%由隔代亲人照管^[2]。农村隔代教养方式下儿童的社会性发展更值得关注。目前对于隔代教养方式对儿童发展的影响到底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研究并未得出一致结论,这意味着隔代教养的家庭系统中还有其他可能的保护性因素未被分离出来,如隔代教养类型、父母教养投入的影响。本研究拟探究不同隔代教养方式对儿童社会性发展的影响,并探索父母的教养投入如何与隔代教养交互作用于儿童的社会性发展,以期为农村隔代教养家庭教育和干预提供实证支持和建议。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一)儿童社会性发展界定

儿童的社会性发展又称“儿童社会化”“儿童社会能力发展”。儿童社会能力是指儿童为实现他们的人生目标并能与他人进行有效沟通所需具备的知识和技能,其中包括社会价值、积极的自我认同、与他人交际的技能、自我调节、计划和做出决定、文化能力、情商等方面^[3]。国内学者陈会昌认为,社会性是由于个体参与社会生活、与人交往,在他固有的生物特性基础上形成的独特心理特性,它们使个体能够适应周围的社会环境,正常地与他人交往,接受他人影响,也反过来影响他人,在努力实现自我完善过程中积极地影响和改造周围环境^[4];其包含遵守社会规则、社会认知、意志、情绪稳定性、自我概念、同伴关系等15个测量指标^[5]。因国内学者对儿童社会性发展的定义和测量指标更加全面和本土化,本文采用以上界定。家庭为儿童提供了最初的社会关系、行为和角色的榜样、社会认知和价值渗透。因此家庭教养方式和环境是儿童社会性发展的重要场所。

(二)隔代教养对儿童发展的影响

隔代教养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隔代教养是指由祖辈完全或部分承担起抚养孙辈的责任,分为完全隔代教养和不完全隔代教养两种类型^[6]。完全隔代教养是指儿童的生活和教育完全由祖辈负责。例如,双亲外出的留守儿童。不完全隔代教养是指父母和儿童短暂分开,祖辈暂时承担养育责任或者祖辈与父辈住在一起共同抚养孙辈。狭义的隔代教养是指祖辈承担主要或全部的抚养孙辈的责任。如学者李阳和曾彬认为隔代教养是祖辈单独抚养孙辈^[7],凌辉等提出隔代教养即以祖辈为主的教养模式,祖辈承担主要责任,对孩子的生活、教育和身心健康施加主要影响^[8]。本研究采用广义的隔代教养的内涵,即包含完全隔代

教养和不完全隔代教养两种形式。

在社会经济转型、城乡二元结构的大背景下,大量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隔代教养是农村家庭迫不得已的选择。对于隔代教养对儿童发展的影响,现有研究并未得出一致结论。一类研究认为隔代教养对儿童的消极影响更大。例如,国外研究发现,由祖辈抚养的儿童中,31.3%的儿童行为问题达到临床诊断标准^[9]。由祖辈抚养的儿童会表现出更多的情绪和问题行为^[10]。与祖父母一起生活在低收入城市社区3-16岁的非洲裔儿童青少年,犯罪率更高,存在焦虑、抑郁情绪以及一系列的适应困难问题^[11]。国内的研究也发现了类似的结果,隔代教养家庭学生的行为问题检出率为15.7%,显著高于亲代教养家庭学生的问题检出率(4.7%)^[12]。隔代教养对6-12岁儿童整体自立行为和学业自立行为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13]。与父辈抚养的儿童相比,祖辈抚养的儿童情绪更不稳定,情绪控制和调节能力更差,爱生气,阻碍儿童的心理健康成长^[14-15]。一系列研究发现,早期隔代抚养对儿童学业成绩和认知能力^[16]、认知发展水平无显著影响^[17],但对心理健康^[18]、性格、人际关系、社会适应^[19]等社会性发展有消极影响。

另一类研究认为隔代教养对儿童发展没有负面影响,甚至存在积极效应。印度^[20]和南非^[21]的研究均发现,祖辈共同抚养的儿童有较低的抑郁检出率、较高的情绪智商和亲社会行为。英国的一项研究发现,在单亲或者继亲家庭中,祖辈养育人承担责任越多,青少年的适应困难越少^[22]。学者石志道对上海地区婴儿期采用亲子养育和隔代养育两种方式的青少年进行研究发现,两类青少年整体心理健康水平没有明显差异,说明不同养育方式对儿童远期心理健康的影响有限^[23]。

分析影响研究结果异质性的因素可以看出:一方面与文化背景、城乡差异、隔代教养类型、比较时参照对象的不同以及儿童发展领域的差异有关;另一方面,研究还未清晰地解释隔代教养对儿童社会性发展的影响机制,例如,隔代教养家庭系统中其他因素如父母投入等的影响。有研究发现,在隔代教养家庭中,母亲和父亲与儿童的依恋可以相互弥补,而祖辈与儿童的依恋无法弥补和替代母亲与儿童的依恋关系对儿童发展的影响^[24],意味着在隔代教养家庭中父母投入可能是一个重要的变量。

(三)父母投入对儿童社会性发展的影响

家庭系统理论认为,家庭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同一家庭环境中的各个家庭子系统的影响是相互交织的^[25]。父母教养投入是维持隔代教养家庭系统正常运转的重要因素。父母教养投入是指父母为了促进孩子健康发展在认知、情感和行为上的投入,是父母教养的核心内容^[26],它侧重父母教养孩子的内容与行为。研究表明,父母教养投入对儿童青少年共情意识^[27]、青少年的亲社会行为^[28]、儿童的孤独感^[29]都有着显著影响。在隔代教养家庭中,父母缺场、亲子分离并不必然带来父母养育缺位、亲子关系断裂,父母可以通过电话、视频、微信等方式让留守儿童感受到父母在位^[30]。研究表明,父母教养投入主要受到自身教养价值态度^[31]、对孩子的教育期望^[32]等个体因素的影响。那么,在隔代教养的模式下,父母教养投入的情况到底如何?隔代教养对儿童社会性发展的影响是否会因父母教养投入的高低而产生变化呢?回答这些问题,有助于厘清隔代教养方式对儿童社会性发展影响的内在机制。

综上所述,为了进一步明确隔代教养对儿童社会性发展的影响,本研究以农村家庭为研究对象,探索完全隔代教养、不完全隔代教养形式与完全父母教养相比,是否会对儿童社会性发展产生不良影响。根据以往的研究经验,我们倾向于假设在完全隔代教养、不完全隔代教养方式下,儿童社会性发展显著落后于完全父母教养的儿童。如果以上假设成立,那么我们进一步推测:父母教养投入与儿童的社会性发展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父母教养投入与隔代教养对儿童社会性发展的影响存在交互效应。

三、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调查对象为农村3-6年级的小学生家庭,填答人为儿童及其父母,所有量表均为配对填答。为了便于对比,我们同时对三类家庭(完全隔代教养、不完全隔代教养、完全父母教养)进行研究。研究者在陕西省某县的农村学校发放580组问卷,回收有效问卷380组。其中,孩子是三年级的占23.5%,四年级的占23%,五年级的占25%,六年级的占28.5%;男孩占42%,女孩占58%;完全隔代教养占总人数的23.4%,不完全隔代教养占总人数的36.6%,完全父母教养占总人数的40.0%;填答人为父亲的占38.5%,填答人为母亲的占61.5%。父母职业中,专业技术人员占4.5%,公务员或事业单位占4.8%,工厂企业职工占13%,个体劳动者(特指农民)或自由职业者占73.2%,其他类型占比4.5%。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在小学及以下的占7.9%,初中或同等学历占63.9%,高中或同等学历占18.9%,大专或高职占5.3%,本科及以上学历占3.9%。家庭月收入在500元以下的家庭占总人数的14.2%,500-1000元的占25.3%,1000-2000元的占22.9%,2000元以上的占35.8%。

(二)研究工具

1. 儿童社会性发展

采用儿童社会性发展量表对儿童的父母进行施测^[33]。该量表由15个因素组成,每个因素4个项目,共60个项目。其中的15个因素分别为遵守社会规则、社会认知、意志、生活习惯、内外向性、依恋家人、情绪稳定性、自我概念、同伴关系、非侵犯性、独立性、诚实公正、共情和助人、好胜心、自尊心。量表采用李克特五点计分,从“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分别记1-5分。总分越高,表明儿童的社会性发展越好。本研究中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为0.96。

2. 父母教养投入

本研究采用伍新春等人编制的《父母教养投入问卷》^[34],对儿童的父母进行施测。父母教养投入问卷共56个项目,为自陈式问卷。由互动性、可及性、责任性三个维度组成。互动性指无论是否有第三方(如祖母)在场的父母直接与儿童互动的行为,例如,“我抽出时间和孩子聊天”;可及性指父母未发生直接互动,但当儿童需要时,父母能做出回应,例如,“没和孩子在一起时,我会主动联系他/她(打电话、发短信等)”,着重显示了现代科技在父母可及性方面的作用;责任性指父母为了孩子长远、顺利发展而做的准备、积累、规划、支持等活动,这些活动没有与儿童直接接触,但会对儿童的生活产生影响,例如,“我以身作则,为孩子树立榜样”。问卷采用0-4级评分(0表示“从不”,1表示“偶尔”,2表示“有时”,3表示“经常”,4表示“总是”)。问题具体包括父母根据自己最近一年来投入儿童教养的行为频率做出选择。得分越高,说明父母的教养投入越高,本次调查中父母投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为0.97。

3. 隔代教养模式

设置一道问题,由儿童填答。问题内容为你属于哪一种教养类型,答案设置为3个类型:完全隔代教养(例如父母在外地工作,完全由祖辈抚养)、不完全隔代教养(例如由祖辈与父母一方共同教养)和完全父母教养。

(三)施测程序

由研究者对班主任老师进行培训后,发放问卷。学生填答完属于自己的一道问题后,其余问卷装入信封,由学生带回家让家长填答后回收。

四、结果分析

(一)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采用Harman单因素法检验共同方法偏差,结果发现,共有26个特征根大于1的因子,且第1个因子的解释量占比为24.30%,小于临界标准40%^[35]。因此,本研究数据的共同方法偏差不严重。

(二)儿童社会性发展在不同教养类型上的差异分析

儿童的社会性发展在不同教养类型上存在显著差异($F = 10.921, p < 0.001$)。事后检验显示,完全隔代教养家庭的儿童社会性发展得分显著低于不完全隔代教养和完全父母教养的儿童,后两者之间差异不显著(见表1)。

表1 儿童社会性发展在不同教养类型上的差异分析

教养类型	N	M	SD	F	事后检验
完全隔代教养	89	227.70	41.53		
不完全隔代教养	139	242.68	29.83	10.921***	A<B,C
完全父母教养	152	248.88	32.96		

注:*** $p < 0.001$, ** $p < 0.01$, * $p < 0.05$; A: 完全隔代教养, B: 不完全隔代教养, C: 完全父母教养。下同。

(三)父母教养投入在不同教养形式上的差异及其与因变量的相关分析

父母教养投入在不同教养类型上存在显著差异($F_{\text{父母教养投入}} = 8.10, p < 0.001$; $F_{\text{互动性}} = 9.58, p < 0.001$; $F_{\text{可及性}} = 6.23, p < 0.01$; $F_{\text{责任性}} = 56.07, p < 0.01$)。事后检验表明:在父母教养投入总分上,完全隔代教养模式下父母教养投入显著少于不完全隔代教养和完全父母教养的家庭。在父母教养投入的子维度互动性、可及性和责任性上,均呈现出相同的差异趋势。父母教养投入与儿童社会性发展之间的相关性显著($R_{\text{父母教养投入}} = 0.41, p < 0.01$; $R_{\text{互动性}} = 0.37, p < 0.01$; $R_{\text{可及性}} = 0.40, p < 0.01$; $R_{\text{责任性}} = 0.41, p < 0.01$),表明父母教养投入越高,儿童社会性发展越好(见表2)。

表2 父母教养投入总分及各维度在不同教养形式上的差异及相关系数

维度	完全隔代教养 (M ± SD)	不完全隔代教养 (M ± SD)	完全父母教养 (M ± SD)	F	事后检验	儿童社会性
父母教养投入	137.23 ± 51.22	154.55 ± 28.89	154.47 ± 29.10	8.10***	A<B,C	0.41**
互动性	50.50 ± 20.87	57.66 ± 11.70	58.48 ± 11.80	9.58***	A<B,C	0.37**
可及性	20.92 ± 7.88	23.63 ± 4.66	23.00 ± 5.84	6.23**	A<B,C	0.40**
责任性	65.80 ± 24.26	73.26 ± 14.44	73.00 ± 14.80	6.07**	A<B,C	0.41**

(四)不同教养形式与父母教养投入对儿童社会性发展影响的交互效应分析

首先将父母教养投入以互动性、可及性和责任性三个变量为参照,做K-均值聚类分析。所有样本分为两类:一类为高父母教养投入组($N = 264$);另一类为低父母教养投入组($N = 116$)。然后,以隔代教养(3种类型)以及父母教养投入(2个水平)为自变量,以儿童社会性发展为因变量,做 3×2 的多因素方差分析,检验主效应和交互效应。把父母受教育程度和家庭收入作为协变量进行控制,结果见下页表3。结果表明,隔代教养类型和父母教养投入的主效应均显著[$F(2, 364) = 9.57, p < 0.001$; $F(1, 364) = 45.75, p < 0.001$]。隔代教养类型与父母教养投入的

交互效应显著 $[F(2,364) = 11.83, p < 0.001]$ 。

表3 隔代教养形式与父母教养投入的交互效应检验

变异来源	SS	DF	MS	F
家庭月收入	176.13	1	176.13	0.174
父母受教育程度	0.02	1	0.021	0.00
教养形式	19398.35	2	9699.17	9.57***
父母教养投入	46385.57	1	46385.57	45.75***
教养形式 × 父母教养投入	23995.82	2	11997.91	11.83***
误差	369027.26	364	1013.81	

进一步进行简单效应分析发现,在高父母教养投入组,三种教养形式在儿童的社会性发展上两两差异均不显著($M_{完全隔代教养} = 251.15, SD = 4.63; M_{不完全隔代教养} = 245.22, SD = 3.17; M_{完全父母教养} = 252.72, SD = 3.04$)。而在低父母教养投入组,完全隔代教养的儿童社会性发展($M = 199.96, SD = 5.06$)显著低于不完全隔代教养儿童($M = 236.28, SD = 5.30, p < 0.001$),也显著低于完全父母教养的儿童($M = 237.39, SD = 5.39, p < 0.001$)(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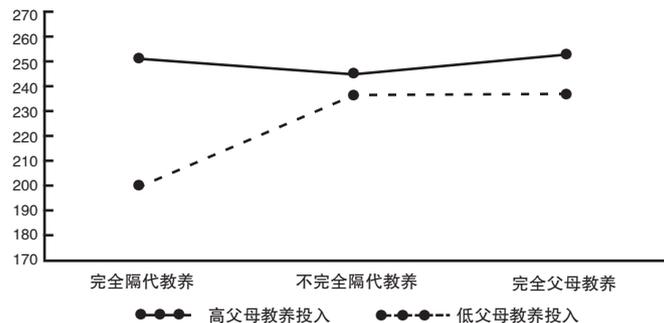


图1 隔代教养类型与父母教养投入对儿童社会性发展的交互效应图

五、讨论

(一) 隔代教养方式对儿童社会性发展的影响

从研究结果可以看出,完全由祖辈抚养的儿童社会性发展显著低于完全由父母抚养的儿童,而不完全隔代教养家庭的儿童未见差异。这说明隔代教养对儿童的发展不能一概而论,只有在由祖辈承担完全抚养责任的家庭中,儿童的社会性发展才会受到负面影响。学者郭筱琳研究隔代教养对儿童认知发展的影响也发现了类似的结果^[36]。与父母同住的隔代教养方式对儿童的言语能力、执行功能、心理健康的发展无消极影响,而祖辈单独抚养对儿童的心理健康发展水平有消极影响。这个结果提示我们,哪怕只有父母一方在身边陪伴,儿童的社会性发展就可以达到正常水平,确认了完全隔代教养方式对儿童发展有不利影响。本研究中的数据也显示,在不完全隔代教养的家庭中,父母投入在互动性、可及性和责任性上与完全父母教养的家庭并无显著差异,这可能是其儿童社会性能够正常发展的一个原因。

(二) 父母教养投入的保护作用

父母教养投入与隔代教养类型对儿童社会性发展的影响存在交互效应。也就是说,即使在完全隔代教养家庭,如果父母能够通过电话、视频、微信等方式,让儿童感受到父母的关注(互动性),认为自己需要的时候父母可以提供积极支持(可及性),多做正面引导,为孩子规划未来(责任性),依然可以弥补父母不在身边造成的负面影响。可能的解释是,在隔代教养家庭

中,父母即使不与儿童在同一时空中生活,父母和留守儿童也可以通过社会互动的不断积累而产生心理上的亲代在位^[37]。这种父母的心理在位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特别是母亲的影响。最近针对中国儿童的研究也表明,在隔代教养家庭中,即使共同抚养人奶奶比母亲陪伴儿童的时间更多,但是只有母亲与儿童的情感依恋才是教养行为影响孩子抑郁症状的中介变量,而不是祖辈-儿童依恋^[38]。祖辈与儿童的依恋无法弥补和替代母亲与儿童的依恋关系对儿童发展的影响^[39]。这些研究结果都让我们更好地理解祖辈父辈共同抚养的儿童社会性可以正常发展的原因。一般而言,父母一方外出,大部分是母亲留守在家,本研究样本中,也是约60%的家庭是母亲留守。母亲在身边的陪伴,似乎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父亲的缺位。在完全隔代教养模式下,高教养投入的父母通过每年与孩子的一两次相聚,以及平时生活中与孩子远程的沟通和情感表达影响着儿童,儿童也通过在场的具象父母与不在场的责任父母的形象,建立了较强的亲子联结,从而缓冲了祖辈教养中的不利因素对儿童的影响。而如果外出的父母缺乏教养责任和投入,不知道如何与孩子沟通,那么就会使得留守儿童暴露在不利教养环境中。祖辈教养对儿童的社会性产生影响的原因在于祖父母对儿童的教养属于“养而不教”。由于文化水平、知识储备和精力等各方面的限制,祖辈能够让留守儿童“吃饱穿暖”已经不易,对于儿童的情绪健康、同伴关系、社会认知、共情和助人等社会性的发展和引导就显得力不从心。而这部分的教养责任显然应该由“缺席”但不能“缺位”的父母来承担。

(三) 启示和建议

国外学者对隔代教养家庭的干预倾向于改善祖辈的抚养质量^[40]。然而本研究的结果表明,对于农村留守儿童来说,强化父辈教养投入更具有关键作用,也更具有现实意义。一方面,父母与孩子的亲子联结具有较强的保护作用,不可替代;另一方面,年轻的父辈比起年迈的祖辈来说,接受新知识和观念的能力更强。学校作为儿童教育的重要主体,要坚持父母是儿童教育的第一责任人原则,摆正父辈教养和祖辈教养的位置,构建与留守儿童父母沟通的平台和机制,激发远在外地父母的养育责任和担当,引导他们深度参与儿童的学习和生活,远程关注并参与引导儿童的情绪健康、人际关系、道德品质的发展。乡村社会工作服务站、公益机构等社会服务机构在对留守儿童进行干预时,要加强对完全隔代教养家庭父母心理在位技能的培训,改变年轻父母觉得自己身在外地,有心无力的认知困境。首先,要让他们意识到,虽然身在外地,也可以通过各种方式与孩子建立情感上的依恋关系和联结。其次,要引导他们增加与孩子联系的频率,学习亲子情感沟通的具体技巧,表达对孩子的关爱与支持,了解儿童身心发展的知识和规律,学会倾听、共情,建立与孩子的亲密情感联结,助力儿童的社会性发展。

(四) 研究不足与未来方向

本研究主要运用问卷调查的方法,且样本量有限,研究结果的推论要谨慎。后续还应该开展追踪研究及田野调查,把祖辈与父辈之间的互动关系纳入研究视野,更清晰地揭示隔代教养家庭子系统之间的相互影响机制,为更好地服务于留守儿童及其家庭提供更有力的实证支撑。

[参 考 文 献]

- [1] 高 耀:《人力资本与家庭资本对高校学生就业的影响——基于调研数据的实证研究》,载《教育科学》,2012年第2期。
- [2] 段成荣 吕利丹 等:《我国农村隔代教养儿童生存和发展基本状况——基于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载《人口学刊》,2013年第3期。
- [3] 马乔里·J·科斯特尔尼克:《0-12岁儿童社会性发展:理论与技巧(第八版)》,王晓波译,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18年版,第2-3页。
- [4] 陈会昌:《儿童社会性发展的特点、影响因素及其测量——中国3-9岁儿童的社会性发展课题总报告》,载《心理发展与教育》,1994年第4期。

- [5][33] 张 晓 王晓艳 等:《北方地区3-7岁幼儿的社会性发展特点》,载《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6年第12期。
- [6] 阙 攀:《隔代教育的不良影响及解决对策》,载《盐城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
- [7] 李 阳 曾 彬 等:《隔代教育对幼儿语言发展的消极影响及对策》,载《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学报》,2016年第7期。
- [8][13] 凌 辉 郑梦娇 等:《隔代教养对6-12岁儿童自立行为的影响:孙辈性别的调节作用》,载《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21年第4期。
- [9] Kelley S J, Whitley D M, Campos P E. Behavior Problems in Children Raised by Grandmothers: The Role of Caregiver Distress, Family Resources, and the Home Environment, *Children and Youth Services Review*, 2011, (11).
- [10] Pilkauskas N V, Dunifon R E. Understanding Grandfamilies: Characteristics of Grandparents, Nonresident Parents, and Children,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2016, (3).
- [11] Sadruddin A F, Ponguta L A, Zonderman A L, et al. How do Grandparents Influence Child Health and Development? A systematic Review,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2019.
- [12] 陈传锋 孙亚菲:《隔代教养家庭初中生的学习困难及其心理行为问题研究》,载《中国教育学刊》,2020年第8期。
- [14] 姚春荣:《家庭环境与幼儿社会适应的相关研究》,载《心理科学》,2002年第5期。
- [15] 威海燕:《祖辈抚养人对幼儿社会性发展影响的因素分析》,载《巢湖学院学报》,2011年第5期。
- [16][18] 曾迪洋 洪岩璧:《早期隔代抚养对初中生教育和健康状况的影响》,载《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
- [17][36] 郭筱琳:《隔代抚养对儿童言语能力、执行功能、心理理论发展的影响:一年追踪研究》,载《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14年第6期。
- [19] 王玲凤:《隔代教养幼儿的心理健康状况调查》,载《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07年第7期。
- [20] Renny P P, Jayasankara R K, et al. Influence of Grandparents on the Emotional Intelligence of Early Adolescents in Kerala. *Journal of the Indian Academy of Applied Psychology*, 2016, (2).
- [21] Profe W, Wild L G. Mother, Father, and Grandparent Involvement: Associations with Adolescent Mental Health and Substance Use, *Journal of Family Issues*, 2017, (6).
- [22] Attar - Schwartz S, Tan J P, Buchanan A, et al. Grandparenting and Adolescent Adjustment in Two - parent Biological Lone - parent and Stepfamilies, *Journal of Family Psychology*, 2009, (1).
- [23] 石志道 曹日芳:《婴儿期不同养育方式对青少年期心理健康的影响》,载《中国健康教育》,2010年第3期。
- [24][39] Xing S F, Liang X, Yue J H, et al. Multiple Attachment Relationships and the Impacts on Children's Socio - emotional Developmen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Grandmother Co - parenting, *Acta Psychologica Sinica*, 2016, (5).
- [25] Minuchin P. Families and Individual Development: Provocations from the Field of Family Therapy, *Child Development*, 1985, (2).
- [26] 伍新春 刘 畅 等:《青少年评价父母教养投入行为问卷的修订及其信效度检验》,载《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18年第4期。
- [27] Yoo H, Feng X, Day R D. Adolescents' Empathy and Prosocial Behavior in the Family Context: a Longitudinal Study, *Journal of Youth and Adolescence*, 2013, (12).
- [28] 侯 芬 伍新春 等:《父母教养投入对青少年亲社会行为的影响:亲子依恋的中介作用》,载《心理发展与教育》,2018年第4期。
- [29] 李佳依 丁 苑 等:《父母教养投入与儿童孤独感:自尊与同伴依恋的中介作用》,载《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21年第4期。
- [30][37] 吴重涵 戚务念:《留守儿童家庭结构中的亲代在位》,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0年第6期。
- [31] 邹盛奇 伍新春 刘 畅:《父亲关于自身教养价值的态度对其教养投入行为的影响:一个有中介的调节模型》,载《心理发展与教育》,2016年第2期。
- [32] 张庆华 杨 航 等:《父母教育期望与留守儿童的学习投入:父母教育卷入和自我教育期望的中介作用》,载《中国特殊教育》,2020年第3期。
- [34] 伍新春 刘 畅 等:《父亲教养投入问卷的编制及其信效度检验》,载《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15年第4期。
- [35] 周 浩 龙立荣:《共同方法偏差的统计检验与控制方法》,载《心理科学进展》,2004年第6期。
- [38] Tan Y X, Ding W, Jiang YQ, et al. Different Associations of Parental Control, Attachment, and Child Depressive Symptoms between Paternal and Maternal Grandparenting Families, *Current Psychology*, 2021.
- [40] 阐明晶 滕树元 等:《美国祖辈抚养对儿童心理发展的影响及改善措施》,载《外国教育研究》,2021年第5期。

(责任编辑:刘 彦)